

I 206.5
C 447

王国维与文学

- 陈鸿祥 著
- 陕西人民出版社

王国维与文学

陈鸿祥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7插页 274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24—00212—7/I·58

定价：4.90元



一九〇五年（二十八岁）在江苏
师范学堂时摄（原刊《教育世界》杂
志）

王國維批常振人
《人間詞乙稿序》原稿。

松

人間詞乙稿序

去歲夏王君辭安其其所為詞得六十餘闕名曰人間詞甲稿余既序而行之矣今冬復蒙所作詞為乙稿以余為之序余其敢辭乃稱曰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據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或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其其一不足以言文學厚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觀也出於觀我者意餘於境而出於觀物者境多於意然非物無以見我而觀我之時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磨蕪能有所偏言而不能有所偏廢也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自夫人不能觀古人之所觀而徒學古人之所作於是始有偏文學學者

此稿係王君辭安所撰

王君先生有道士之想遠矣
 質屋而所以用木也師 茲仲以聚天來則當神者三惟此者教近百頁即費却不
 少和其言外若芥米不知者能始遠述其神與捕其佳者且要法下多因其上而力法者
 當併在所中上卷以版人制度亦已世修神又多因而誤釋之言且說遠費全者是宜
 哉其日收老也中其言人其為世學問也文持到會之益使力者費情三教日全同殊
 不必一公一觀此書當以 司司也也其推亦上而而擇例了雖日寫好相日以定其文也六以
 世事也 乙老寫其手詩視於十八矣二而或世事不月假任一為三時二而擇其善者為
 其則其詩如去年選其善者清談論九佳其家漢家語云之善者術也看官當義上
 今于佳法或此由乙之非此分事不詳也此後京所未者皆言 以在末大費者無不也
 云云云此亦重登也則宜有佳至王胡清則若單周相人進信宗人對史當以意重行
 而其法取好史之云云三之已有說今日以 自油本什 乙老而四只為我于 作家得佳世
 其辭賦有佳者而由史林名地也 且其言也 近日此三以 官事 其自家語語前流
 誠日中身身既 天行若也 亦多其此流清
 道其不異 國律為科 乙老之海法年

札書玉振羅
 一九一六年
 羅供稿
 羅祖繼

第一章 人生及美術之概觀

王國維

第八期七十三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憂患與勞苦之與生。相對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憂患與勞苦者。人人之所惡也。然則。詎不人人欲其所惡。而惡其所欲歟。將其所惡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終非可欲之物歟。人有生矣。則思所以奉其生。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寒而欲衣。露處而欲宮室。此皆所以維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則數十年。多則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為不足。於是於數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進而圖永遠之生活。時則有犧牲之欲。家室之累。進而育子女矣。則有保抱扶持飲食教誨之責。婚嫁之務。百年之間。早作而夕思。窮老而不知所終。間有出於此。保存自己及種姓之生活之外者乎。無有也。百年之後。觀吾人之成績。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種姓之生活之外者乎。無有也。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種姓之生活者。非一端也。於是相集而成一群。相約束而立一國。擇其賢且智者。以為之君。為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學校以教之。為之警察以防內奸。為之陸海

紅樓夢評論

引入“王国维与文学”刊
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之“
红楼评论”(甲辰(一九〇四年
四月八期)

为罗振常题笔 (昌黎诗)

夜吊高秋露度悲
飲退永寒蟲樹法警抱成
就新退永寒蟲樹法警抱成
惴惴前趨新退永寒蟲樹法警抱成
猛識歸
更愚
說得汲古蓬
字猶名修古蓬

引 言

王国维，字静庵（安），号观堂。他 36 岁以前，潜心于词之写作、词曲史资料搜辑以及进行文艺史研究的时候，曾号“人间”。

王国维是数千年来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最后一位巨子，又是进入本世纪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学术上的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承先启后的关系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既是一个结束，又是一个开端。所谓“封建式”的思想感情与“近代式”的研究方法交织在一起，使他成了一个典型的新旧矛盾的人物。

国内外新老学者，都非常推重王国维，尊他为“史学大师”。名列学界“四堂”^①之一的郭沫若，曾将鲁迅与王国维加以比较，在指出两人的思想与所走的道路上“却有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的同时，称他们一个是“新文艺的开山”，一个是“新史学的开山”，认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②。我想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些评鹭在今天应该更是无可置疑的公论了。

是的，王国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学贯中西，既精且

博。综其一生，则史学之外，举凡哲学、教育、文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等广泛的领域内，均有重要建树。在所谓殷虚文字、钟鼎彝铭、汉简唐卷、齐鲁封泥、汉魏石经、蒙元史料的研究上，尤有前人不及的造就。可谓新学旧学，熔于一炉。据他的门生赵万里统计，在他“五十之年”的一生中，著译之书凡六十二种，批校之书一百九十余种。除此以外，尚有一批遗著，例如：校注《水经注》、编校藏书志（以上两种已整理出版）、辑录词目、批校词曲，以及所译法学、哲学（包括美学）、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亦称“辨学”、“名学”）、教育学，乃至数学、动物学等著作^②，其数盖在百万言，尚佚散在外。他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观堂集林》。他的文学论说与文艺史研究著作，主要有《静庵文集》及《续编》、《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

毫无疑问，王国维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他的学问在事实上当然不会是“无涯岸之可望”的“完学”。尤应指出者，他不是凭着“天致”，而完全由于“人力”，基本上是靠“独学”（即自学）才成就了“大学问”的。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王国维的目的，完全是为着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要在思想上总结他的教训，而且要在理论上和学术上历史地唯物地肯定其所是，摈弃其所非，探索他所达到的，超过他所未及的。这在文学上尤其应当如此。

本书试图将王国维的生平学业与他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作综合的考察。书名《王国维与文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王国维与文学之一般关系。概述其文学生涯，以探其本人在文学上经历的曲折道路。

其二，王国维与近代文学之关系。概述其著作与论说，以探其在近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位置与影响。

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从顾炎武开始，清代的“朴学家”一向尊重“考据”，而轻文学，致力于“经史小学”，视诗词歌赋为“小道”，更不屑于顾及戏曲、小说。王国维既继承了清代“朴学”之所长（考据），又能摆脱前辈“朴学家”的陋见（轻文），从少年时代起就“嗜好”文学，到青年时代更热衷于文学。他在文学上的活动主要是：

第一，诗词创作，大致起自“戊戌变法”前后，迄于《人间词》的创作，历时十年左右（约当1897至1907年），其主要作品有《人间诗集》（亦名《静庵诗稿》、《观堂丙午以前诗》）、《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等。

第二，文论写作，大致起自辛丑（1901年）《教育世界》杂志创刊，迄于《人间词话》问世（1908年），历时七八年。主要是以《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文学批评与以《人间词话》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词的鉴赏、评论，兼及美学、文学理论的探讨。

第三，文艺史研究，大致起自北上前清学部图书局任职（1907年），迄于壬子“避居”日本（1912年）撰写宋元戏曲史，历时约五年。主要是从事词典史资料搜辑，相继纂辑《词录》、《曲录》等专著；而其研究成果，则集中于《宋元戏曲考》。

所以，我们说王国维的“文学生涯”，便是指他36岁（1912年）以前的文学活动。就他所从事过的诗词、文论及文艺史的研究与写作的造诣、贡献、影响而言，我们又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诗人、文艺理论家与文艺史研究家，并且构成了一

个首尾贯穿、相当严密的创作、评论、研究体系，概言之，可称“王氏文学体系”。自此以后，虽然不能说他完全中断了与文学的关系，但那也只是“以余力及之”了。即如诗词写作，在壬子、癸丑年间（1912至1913年），他虽然写作了以《颐和园词》为代表的一批哀挽清室复亡的新旧体诗《壬癸集》，这对于了解他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态度、学术转向，以及剖析他何以做了前清“遗老”的思想原因，都极为重要，但那已经在其“文学体系”外的非“纯文学”之作，需要另作专论了。

由于上述缘故，本书对王氏的文学活动，断限于1912年《宋元戏曲考》的写作。对于其后与文学有关的研究（如司马迁生平考证）及论说（如自述《颐和园词》因而涉及“长庆体”诗者），附及之。故全书除导论概述其生平学业，结局评述其“自沉”悲剧以外，分创作、评论、研究三篇，再由每篇内对其代表作及主要论说，分章叙述。

这就是本书的大致脉络。

①“四堂”之说，出唐兰：“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证，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体例，固已极一时之盛。”（《古文字学导论》）

②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历史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其所译之书，举其主要者：1905年以前，有《法学通论》、《教育学》、《哲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以上皆日人所著，属高等师范教科书性质）以及《西洋伦理学史要》（英·西额惟克著）等；1905年以后，迄于1910年，有《心理学概论》、《辨学》（即《逻辑学》，严复初译为《名学》）、《教育心理学》等（以上皆出欧、美学者）；此外还“译述”过谷鲁斯（王氏译哥罗宰）的《游戏论》等。

导论——世变沧桑说生平

说与江潮应不至。

潮落潮生，

几换人间世！

——王国维《蝶恋花·辛苦钱塘江上水》

一、“先前阔”的家世

王国维生于1877年12月3日，按照旧历，就是清光绪三年丁丑10月29日；卒于1927年6月2日，即农历5月3日。他是在北京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期间，正当北伐军跨黄河，入京津前夕，投颐和园内之昆明湖自尽的。

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他的故乡海宁县盐官镇，旧称海宁州城，位于钱塘江畔，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诗人”（茅盾语）徐志摩故家硖石镇比邻相望，是著名的观潮胜地。

王国维祖籍开封，是在北宋末年随宋室南迁浙江的。

他的远祖王禀，是宋徽宗赵佶在位之际的将领。禀之父光祖、祖父珪，亦为北宋战将，《宋史》有传。王禀曾参与了宣

和年间“擒方腊于帮源山”之役，镇压农民起义。靖康元年（1127）9月，他以副都指挥使守太原，在与入侵金兵激战中“部曲尽亡”，他也抱了“太原庙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王稟之子荀、庄、崑，在南宋时都封了大官。其孙沆，曾“扈从”宋高宗赵构南渡，于是“赐第监官，遂为海宁人矣”。而王稟本人，更被追封了“安化郡王”，谥“忠肃”、“忠壮”。

由于王稟生平事迹未入《宋史》，王氏宗谱所载亦不彰，到了王国维晚年，特撰《补家谱忠壮公传》，将其“用必死之兵，当蚩尤之攻”，“粮尽援绝，父子殉之”之“忠”，引为“家门之光”^①。当其父王乃誉去世之际（1906），王国维在一篇讣告式的文字中，不无感慨地说：

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以迄于府君。^②

他的这位“府君”乃誉公，字与言，号莼斋，晚号娱庐，自称“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在其生前日记中追述：“十六世考，国学（按：疑夺“生”字）世杰公”；“十七世考，庠生德赐公”；“十八世考，任内黄县云华公”；“十九世考，孝廉养字公”；“二十世考，廩生纬寰公”；王国维又补述二十九世，即王乃誉曾祖以下各代：

曾祖，国学生地封朝议大夫建臣。祖，国学生溶；本生祖，国学生瀚。父，国学生嗣铎；本生父，国学生嗣旦。^③

大致推算起来，自王稟殉难(1126)迄王乃誉出世(1847)，历721年，而以第十六世的王世杰居其中，约当明弘治至正德年间，再至清咸丰，三百数十年间，虽不乏“读书人”，却未见有有名士或显官者；及王乃誉出世，适逢太平天国革命，乃“弃儒经商”，只能“于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嗣后充任江苏溧阳县府“幕僚”(师爷)，才“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技益大进”，达到了“其所成就，虽古人无以远过”^④，并著书立说，留下了《游目录》、《娱庐诗集》等著作，又综其三十年日记曰《娱庐随笔》，为我们了解王国维的青少年时代及其家学渊源，包括早年的美学观与文艺思想，提供了至可宝贵的史实性的“第一手”记载。

王氏的同父异母弟王国华，回述王氏父子间的承袭关系，有道：

综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攻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内外，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⑤

我个人认为：若论家庭影响，王国维晚年缅怀其“先前阔”的家世，表彰其远祖“忠壮”之“光”，与他死后被逊帝溥仪“谥”了个“一文不值”（郭沫若语）的“忠愍”，不能说全然无关；但更直接的还是“父学”的影响，尤其是王乃誉能于“孤贫之中，阡陌之内，克自树立”的“自学成才”的奋斗精神，应该说对王国维这样的“寒儒”既不以“天致”自矜，亦不为“才弱”自馁，并能在飘忽无定的“世变”中，“自道于声色货利之域”，作“深湛之思”，锤“创造之力”，是起了

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二、不守八股“绳墨”的“诸生”

王国维自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其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一般地认为，他的这种“忧郁”即“寡言笑”的内向的性格，与自幼丧母，缺乏母爱，不无相当关系。除此之外，他的家庭，虽勉强可算“书香之家”，但与前辈或同辈中的出身“世族”的“文学之士”相比，实在差得很远。王氏自述：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①

据此，论者涉及其家庭，或称“小官僚”，或谓“封建士大夫”；而就其经济地位看来，大体上是由“亦商亦儒”转为“亦儒亦吏”的中产之家，恐较允当。王国维日后之挂着“封建遗老”招牌而兼了“资产阶级学者”的“一身而二任焉”的尴尬身份，不能认为与其家庭的“烙印”全然无关。

在这样的家庭中，少年王国维的读书生活应该说是比较清苦的。除了就读私塾以外，尚有一些家庭藏书供他课余阅览，自述：

家有书五六筐，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

十六岁那年，他赴杭州应试考入了“州学”（秀才），同时开

始接触与他后来的学业有关的“三代两汉之书”，自述：

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⑦

是时，他已有“海宁四才子”之称而“名噪乡里”了。但是，尽管才冠侪辈，博览群书，由于少年王国维“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按：八股）绳墨”，所以在“治举子业”上极不走运。在他二十岁前后，曾两度赴杭州应“乡试”，皆未中而归。父亲乃誉公虽然“喜谈经世之学”，很早向往“维新”，并不强求儿辈中举，但“一家十口”的生活，不能不使他要求作为长房长子的王国维尽快谋职业以“度衣食”。

当王国维十八岁（1894年）的时候，遇上了中日“甲午战争”。接着，发生了康有为领衔的请求“变法、拒和、迁都”的“公车上书”（1895）。目睹国势衰颓，政治腐败，加以“维新”思潮的影响，王国维决意弃科举，求“新学”，自述：

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亦不能专力于是矣。^⑧

看来，“新学”并不能治他的“忧郁症”。当时所谓“游学”，近则走“东洋”（日本），远者去“西洋”（欧美），这对于“略足以给衣食”的王国维来说，都是力所不及的。他只能“望洋兴叹”，“权充塾师”，因而愈益“怏怏”寡欢。有的学者概括王国维的“性格特点”是“苦闷的神经质的天才”，或“忧郁性的神经质的好学深思的天才”^⑨。从以上简略的回

顾中，我觉得有理由认为：这种“苦闷”或“忧郁”，实在是由于天才的追求与束缚其追求的家境及压抑天才之发展的科举制度形成的，而决非出于“先天”。

三、在“变法维新”中交结罗振玉

王国维的一生，相继经历了“戊戌变法”（1898）、“辛亥革命”（1911）、“袁世凯称帝”（1916）、“张勋复辟”（1917）、“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和导致他最后自尽的“北伐”战争（1927）。其中，直接影响其思想、学业，以至生活道路的重大“世变”，应该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前者发生在他求知欲最旺、思想最活跃、事业尚未定型、生活道路有待选择的青年期；后者则刚好在其思想趋于成熟，学业上作出成果的壮年期。当然，从时代的进程而言，这两次大的“世变”都在近代中国的史册上留下了非常光彩的篇章。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大“世变”中，虽然软弱但毕竟代表了新的历史要求的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推翻了亘延近二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拉下了马。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从王国维本人的思想发展与抉择的道路看，他虽然有限度地、主要是在摆脱科举老路的意义上接受了“维新”的要求；而对于每一次“世变”，就象他晚年自选其词题曰《履霜》所表明的那样——无不怀着“履霜坚冰至”^①的恐惧，从怕“共和”始，到怕“共产”终，一次比一次陷入了更深的、不能自拔的倒退之中。

但，这也并非完全不可思议。就象恩格斯谈到“有时非常伟大”、“鄙视世界的天才”歌德，“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

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①一样，作为一个能适应书斋而不能适应“世变”的学者，王国维只有在他自己的领域，——不是象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变法”风云中做“先时之人物”

（梁启超语），而是在“宁静的书斋”中做“先时之学者”的领域里，才会显示出他的“伟大”与“天才”，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了敢于“弃旧从新”的并不完全“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非“庸人”的进取精神。

这是又一个矛盾。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促使他象青年鲁迅一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②。他离开海宁家乡，来到了上海。时间是在1898年初春。“别样的人们”是谁呢？第一个就是充任着由梁启超执“主笔”，章太炎任“撰述”，“专以启民智，伸民权为主旨”^③，并以鼓吹“变法”，激励人心而使“海内为之震动”的《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穰卿）。

但是，这位“以新进士不应朝殿试”而改入了“康党”的“馆主”，看来并不重视王国维求“新学”的热切愿望，也不理会这位“简默不露圭角，自待顾甚高”的来自县城里的“诸生”的才学，充其量不过把他视为稍通文墨，略能抄抄写写，因而“袂被至沪”，以谋“菽水”的伙计而已。所以，入馆不久，他就萌生了“自定去留”的念头，说：

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哉！^④

然而，尘海茫茫，何处可去？“进退两难”之中，他遇到了第二个“别样的人们”，就是后来与他结了“金石之交”，并做